

## 真理的传说<sup>①</sup>

世上原来并无真理。好战的游牧民不需要真理，他们需要的是高尚的信仰。谁能说，在一场厮杀中会有什么真理的存在？

随后，农夫们缓慢的劳作也只需要总体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片茫茫大地的恒常因素以及季节的可靠信仰。我想象着农夫在欢迎流浪的神祇，他既不激动，也不怀疑地倾听着他们的奇迹，也不管他们那些虚无缥缈的话语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骗人的；而在野外，绿色的麦穗则渐渐与黄色相混。他渐渐地习惯于谷物的缓慢生长，他的思想也慢慢变得柔和起来。他不要求他所看到事物局限

本篇是萨特 1929 年所写手稿，最初由尼赞送交“欧洲出版社”，但遭到了拒绝。于是，萨特放弃了发表它的打算。后来，又由于尼赞的帮忙（尼赞当时为“比菲”Bifur 杂志撰稿），本书的一个片断才得以在该杂志 1931 年 6 月第八号上发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片断。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萨特设想把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的方法。西蒙娜·博瓦尔在《年富力强》一书中写道：“萨特这次又以故事的形式来表达其思想……，萨特的后期思想在本书中已见端倪，他已将不同的思想方式与人类集团的结构相联系，‘真理来源于贸易’；他并且把贸易与民主联系起来。当公民把自己看作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他们必然对世界作出相同的评价，科学正表达了他们这种精神上的一致性。而杰出人物则鄙视这种普遍性。他们创造出人们称为一般的观念这种东西仅供自己享用，可这些观念只达到某种不确定的可能性。萨特厌恶这些小集团的意识形态更甚于学者的一致主义。他同情那些被逐出城邦，被赶出其逻辑、数学大门的身怀奇术者，这些人孤独地游荡于荒野之上，他们只依靠自己的眼睛来认识事物。所以，他（萨特）只把理解活生生的现实的特权赋予艺术家、作家、哲学家以及他所说的‘孤独者’。”

在某种不变本性范围之内，相反，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事物的突变，因为他相信他的神秘能力能够赋予事物以某种为我们的理性尚难以把握的多变统一体。在其思想中，兽群的嘶叫不再纠缠他，他在思想中享受着绝对的清静。这些就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但又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力量，看来，这些力量只有他才配得上。如同旅行归来的人在逐个注视着他周围的亲人，一些人笑容满面，另一些人热泪盈眶，同样，他的目光也从一个思想转移到另一个思想。微光下，这些面孔转向他，就像植物转向阳光一样；他有时为在自己身上感觉到有这么多活生生的东西而害怕。

真理来源于贸易，它伴随着第一批制成品而来到市场。它曾等待着这些制成品的产生以便从人的头脑中完全成熟地诞生出来。

人们为满足乡村生活的需要而构思出这些物品，它们还带有原始的简陋性质；一只带有粗糙把柄的圆壶仅仅是喝水动作的轮廓。刮削器、钉齿耙、石磨看来也只是那些最常用的协商动作的另一面。必须从这些活动中发掘出某种单一的思想，即处于静止状态的、固定不动的、闭口不言的、永不衰老的、依赖于客体更甚于依赖精神的思想——这些遥远年代的第一个无人称思想，即使人不在场时，这一思想仍将超然于人们用双手创造的产品之上。

如果说，怀疑论确实来源于田野，并带来了秃子的推理、有角物的推理及古量具的推理，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观点能促进庄稼的收获的缘故。但是，那些永恒的话语应该谈论这些生来即死的最初工具。即使这些工具毁灭了，然而人们能够谈论它们的话语却依然是有效的，甚至没有任何微小的变异来搞乱人们的判断：如果瓦罐掉在地上，便会摔得粉碎，而以它命名的思想一旦被解放后，立即跳到空中，随后又降落到其他瓦罐身上。

总之，当手工业者在加工火石或粘土时，他完全意识到他开始关心样式的形成。但如果他的努力突然半途而废了，那么他根本就

没有达到美的程度，而在此模糊范围内，角、棱、面都是艺术与真实中不清楚的因素。

人类最初的制成品就是这样，它们应该绝对地与自然的产物形成对照。一旦制成品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手工业者便处于一种惊奇的状态，这种心情只有某些学者面对数学本质时所怀有的心情才能相比。惊奇使他们距离发现真实思想的著名神话已经不远了。

剩下的由经济学来完成。市场上，神祇们的天真宾客尝到了欺骗的味道。人们在说真话之前先说谎话，因为问题仅在于掩盖某些新的、独特的性质，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些性质的实在性程度。一个对付欺骗的公诸于世的自发回击立即带来了最初的真理，这些真理当初还不叫真理，这个以后将享有无限荣耀的名字：它们只是对付骗子的特别预防手段。每个人都颠来倒去地反复观察商人的瓦罐，他留意在其准则中保存对此瓦罐的特殊观念，并把他的所有的发现都和此观念联系起来。人们要说明这个道理：瓦罐不可能既是未受损伤的，同时又是有裂缝的。可谁敢对大地自生的果实也作类似的限制呢？然而这里，人们只是从粘土中挖掘陶器商的隐蔽意图。人们还采取了许多这样的预防手段，这些手段从不由某个一般原则演绎而来，市场治安中的这些规则主要产生于局势，被决定的沉思、甚至商品的性质。所以，这些年轻的真理开始仅是货物贸易中的调节原则，这些原则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并与工业产品相一致。真理来源于人对其产品，而不是对自然存在物的沉思。

语言市场很容易便建立起来了，其所在地与拍卖货物的地方绝无丝毫的差别。那里，人们相互交谈着商人们的排场，他们精心算计的把戏及谨慎施展的诡计。言论的产品便先于其他产品而取得了合理化地位，唯一的模式便成为必需的了。似乎人们在确立此模式时已考虑到了最贫穷者的需要及其购买的可能性。这样，简

单、明白，且又持久的实质性东西便通行起来了。

市场的威力使人摆脱了他们的巨大的内在力量。他们按照木头工具的形状，把车床、钳桌引进了他们最秘密的内心，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把握了无法模仿的性质并着手运用这些性质。他们并没有蛮干，他们弯下腰，又直起来，使结扣跳开，使刨花飞溅。然后，他们把刨得很细巧，弄得方方正正的手工制品拿到集市上去，可这些制品却比我们更接近它们原来的质地。当然，人们有时会受骗，买回一些懒惰的母马或骗人的空话。他们在使用过程中才发觉上当了，因为不能把它们转让给别人。像化过妆的牲口突然暴露了它们的缺陷一样，这些粉饰过的思想突然显得光秃秃而无法解释。于是，受骗者惊恐万状，因为只有他的头脑里才有这些思想，结果他狂怒地抛弃了它们。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人们逐渐习惯于使用言语，就像那些咬着硬币，或者把硬币在大理石上弄得叮当直响的货币兑换商一样：每个人都从他的最高处让硬币落在自己的跟前，一边倾听它们发出的声响。明显性以及为对付这些预防手段的手段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当他在做这些事时，他是在进行交易，也没有人相信存在着某种真实的经济学。这是因为，每个人在家里记帐时，由于他在记忆中重又找到了在最近几次买卖中他自己的货物，于是便认为他没有付出任何东西却得到了新的东西。

这样，思想便慢慢地进行着从不变资本到可变资本的转变。

但是，人在他内心感到有一种神秘的混乱，他试图用大部分还属于神话的办法来解释这种混乱。这样，他便分两次创造了真理的传说。要描述一个形式如此多种多样的神话，我感到有些为难。为了正确地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把神话看作是当时人们内心混乱的转换，需要首先加以说明的正是这种混乱。

如同人们长时期地创造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

思想。就像由于阳光的作用而在尼罗河软泥中形成的埃及动物，这些动物生来就只有半身，因为它们尚未形成的脚融于泥中，同样，这些思想也紧附在人的肉体上。它们与事物除了有伟大的普遍好感外，没有别的联系；它们对事物除了有神奇的作用外，别无其他作用。它们并不如肖像与模特儿那样与事物相像，而是如一个家庭中的妹妹与哥哥相似一般；它们不表达植物，就像植物不表达大海一样；但这些思想却像植物、风暴、大海那样（随着季节：春分或秋分、潮涨和潮落、过早或过迟地生长、后退和前进、花朵迟疑地开放）经历着某种被拆散或解开的东西，总之是某种绝对自然的表达方式。

可是，突然来了一阵不可抵抗的运动，它一下子把这些思想推到了世界的另一头，推到工业产品中间。人们小心地从中抽出思想的生命，割断了它们与自然界的联系，把一些技术规则强加给思想的生产，总之，思想成了技巧的但却无生命力的可贵成功。同时，人们又赋予思想以“表象”这一可怕的头衔，这样便产生了新的荣耀和义务；于是，一群陌生人便不停地涌入每个人的精神以便控制表象作用的行使。人不再是孤单一人了。当他用人们向他规定的工业方式来处理其思想时，他不再把这些思想认作是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看来是清晰的、独立的、明确的，但与他的生活、他的内心相距是如此之远，以至他不能相信它们来源于他，他甚至设想他是从外部引进它们的。这样，他便与自己的精华部分相分离，他身上便只剩下身体的有机运动、激情和盲目的骚动。在这个受折磨的、为自我羞愧而痛苦的肉体之上，小人（Homunculus 炼丹术士声称能够创造的身材极小的人物——译注）精神在翱翔，这个精神已经被称为是“无人称的”了。这是，基督教的谦恭已经显露出来了。总而言之，尊敬、羞愧、对知识的需要首先产生了四尊神祇，它们之间没有多大的共同之处，然而它们都是同名者，如同希

腊有无数的腓比斯（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一样。

通常，那些倾向于赋予物质以比劳动更大价值的普通人们则赋予我们的观念以某种可贵的、精细的实体，他们称之为真理。他们认为，即使磨损或烈火抹去了我们辛勤劳动的所有痕迹，真理将重新获得其自然地位，而没有丧失其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相反，那些较为讲究的人，他们为技术方法的多样性而大感惊异，他们崇拜的是形式。形式像一只鹰隼，从太阳那里径自扑向它的猎物，随即又返回上天之路，而把它爪子的奇妙痕迹永远留在我们中间。形式这位女神也叫真理。

妖术发言了：观念和其对象的关系是按照把人与蜡人小塑像联结起来的活生生的、不可逆转的关联图像而被设想出来的（人们可以看清这些塑像的心腹）。人们把观念的生产看作是某种神奇的仪式；他们似乎在心中模仿事物以便把事物活生生地引入其中。这种巫术同样也叫真理。于是，这个魔法便无动于衷地前去考察对象本身。然而，真实思想的对象仅仅是艺术作品，如陶瓷器、刀具、首饰等一切在其比例中没有抽象的合理性便不能存在的东西之总和。正如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裴莱贝篇》*philèbe*（希腊原文为 *philèbos*）的最后几页中看到的，人们在想象度量的神圣威力，想象把存在物从虚无中抽出的活力。这一力量是人类技能在神话中的反映，它通过与自然的同化，也取名为真理。以至人们从此便可以说，“并非因为事物存在着，它才是真实的；而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它才存在。”

形式、物质、关系、度量这四尊神祇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其他三位屈服的程度。它们马马虎虎凑合地生活在一起，等待着它们外来的决定性统一。

当时，一切事情都由商业头领来决定：直到那时，贸易和真实还要求人们对某些原则达成协议，这些原则像契约一样繁多和独

特。于是，头领觉得要把这些原则压缩一下。无疑，像那些用米这个单位代替了我国古代外省的衡量度的人一样，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富于抽象能力的人物。商人们按照贸易的同类性质沿街聚在一起，而完全不知道支配身旁贸易的惯例。这时，一位传令官前来宣布说，为了这个一般的准则，应该抛弃一切个别的原则。他带来了混乱和不安。“一个事物不可能既是它本身，同时又是（从同一角度）它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

一旦商人们和这个新的规律相熟悉，那么，一切能把沉思带回到过去，带回到历史的解释的通道便被堵塞了。同时，四尊互为敌手的神祇，仅管它们相互纠缠在一起，却失去了它们各自的轮廓而融合为一体。然而，这个新的偶像并没有在其内部解决相互间的不相容性。（可以设想：一个思想如要真实，它就应该涉及到一个现存的对象；而一个对象如要存在，它则应该是真实的，即为真实的思想提供材料。人们承认，思想的真实性可以仅仅通过观察思想本身而显露出来；同时也承认，这个真实性在于观念与对象的关系之中。）给这个新偶像以其统一性的是其信徒对其矛盾毫不关心的强烈愿望，而不是其本身的内在和谐。这样，便诞生了那些伟大的神灵，它们吞噬着全副武装的、活生生的地方小神。一阵微风轻轻掠过尘世及众灵魂，掠过精神中的真理、事物中的真理、精神与事物密切相连的真理以及宇宙中这永不衰竭的力量。这一力量很快便悄悄取代了这个没有面目的神祇，从前的野蛮人和以后的社会学家称该神为超自然力（Mana）。

这些想象中的本质所在（它的影响巨大，且波及面极广），就是偶像的最后装饰——永恒。永恒畅行无阻，因为人的羞怯使他看不清楚：他发明出来的东西，他还以为只是发现了它。所以，这些隐蔽在某个地方并仅为自己的事情而操心的极为美丽的姑娘必须存在于他的面前。“注视”这个词颇受欢迎，它取消了最后的恐惧（red-

outes)。问题不再只注视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无动于衷的世界，这个世界饰有花边，它的结扣被打好又被解开，它有前厅和导管，它的一些形状转变为其他形状，它的一些形式只要略微偏差一下便转变为其他形式，如同那些几何图形一样，这些图形是六角形还是三角形无不以眼睛的运动为转移。像在以后的基督教诡辩时代中一样，真理的献身便以下述论证而得以完成：

“我有思考我所意愿的东西的自由。但是我只能思考真实的东西，因为非真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无疑，真实早已存在，它已被制造、装饰完毕，它处于我的目光之下；我在自身感觉到了我那被剥夺了的自由的指责，如同感到不安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样看问题是错误的。这里，我再次可以自由地思考我所意愿的东西，因为我只愿思考真实的东西，因为我的自由只是一种把我从假象中、从我的自身中解救出来的能力。现在，使我烦恼的只是懦弱以及别出新裁的利己主义。正当的道理则把事物放回原处，把我的身体置于其他身体之中，并发现这副无人称关系的骨架，它支撑着我那虚无缥缈的可怜肉体。倘若我能将构成我的本质的真理一直提高到真理之母的心中，并把它们与透过完美无缺的形式的纯气重新结合起来，那我就太幸运了。”

这样，人便被剥了皮而与他们的身体形影相吊，而且他们还蔑视自己的身体，而他们的精神则在那些被制造出来的本质上碰得粉碎。自然界及其奥秘、狂风、突然穿过天空的流星（如同手指在沙滩上划了一个符号）、向太阳伸展其参差不齐的枝条的树木、山谷、乡村，还有与天气的光线和色彩一起构成的渗透着某种晦涩而又固执的意义的物体，这一切都化为乌有，如同在黑夜火炬手拿着燃烧的火把突然感到世界变小了一样。没有人抬起眼睛，也没有人设想将真理像利剑一样刺入事物的心脏：从真理的降临到科学王国的诞生，这其中还缺少一个中心环节。

所以我说，真理这个贸易的神话女儿，这回由它产生出了非常现实的民主制度，某种独特而又唯一的政体，而所有其他政府只不过是该政体的昙花一现的形式。

一些哲学家说，他们那宝贵的不平等可以一直追溯到黄金时代，这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时不平等尚不存在。如果他们想收集关于不平等的起因材料，他们可以到那些落后的部落中去寻找，在那里，妇女之间被禁止讲男子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不同的句法、规则和思维方式。而男子则恰好能够使人明白他的意思以便发号施令。至于其命令中的其他意思则犹如陨石一般从不知名的天体上掉落到真实和虚假的那边。以使用一块块巨大、坚硬、荒僻的石块填满这些下等的灵魂。那些来自天上的命令、众人的感觉（即主人的意图是无法识破的）、以及从原则上说与他达成协议的不可能性，或者，即使达成了协议，也不可能从相同的道路出发而并行不悖——所有这一切最终只会迫使人们赤裸裸地使用暴力，或使用神奇般的内在威力，能把不平等带入人间的正是这些东西。

但是，在他们的新偶像面前、在严峻的真理面前，即使是最卑贱的人也感到与那些大人物是平等的。奴隶能够明白主人的命令，如果不能的话，他也知道主人服从的是其肠胃的意愿。一切命令，不管它多么蛮横，也总是以某个先决的协议为条件的。至于那些头领是腰缠万贯的老头，还是凯旋而归的将军，或者王子，这都无关紧要。受诡辩家支配的青年富有者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垄断了文字商品。从此，他们便在集市上、在公共场所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这个聚集起来的资本只是交换的对象，正因为人的一切努力都在于把他们的思想从自身中解脱出来；也可以看到，这位隐藏在其政治思想武库后面的昙花一现的主人并没有按照他唯一的本性来发号施令。相反，他是通过谋求与大众达成的协议，即通过他口袋里装有的大量各种各样的契约来做到

这一点的。

所以，在我们看来，在这个时代看来，真理在那里，它使一切都平起平坐。无疑，阴谋家比一般人更先看到这一点。但每个公民内心都在说，如果某个诡辩家向他指出真实的观念，他也能像诡辩家那样在自己的记忆里坚持不懈地保持住这个观念。此外，当阿尔西比阿尔（Alcibial）向阿拉贡（Aragon）论述某个观点时，这个观点便不再是他的了，他只有不断更新他的财富，他才能维持他的盛名。

苏格拉底停下来与一个奴隶讨论数学图形，他好像在说：“他和我一样，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执政官。”

这个民主政体比历史更古老，其本质在于：所有的人都始终能够取代另一个在位的人，因为，建立在协商、说理基础之上的苏格拉底式的谈话在他们之间总是有可能的。正是这一民主气息，在最专制的君主政体下启发了这个人，他写道：“常理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东西。”

法老的神性的上升、帝王崇拜的罗马偶像及天赋之权，统统都只是儿戏、诡计，或者是装饰品：我要看清我的研究对象，便把它们统统撇到一边。从此，我所考察的城邦是由平等人居住的城邦。

高大的城墙保护着人们免遭自然界的伤害，远处是森林，它们沉默不语。唯有天空高高悬挂在城墙的上空，那时，已经有些人在城墙上画三角形了。房屋按照尺度的规定排列成一行，透过百叶窗，它们都包含着某个真实的思想。每个公民都感到被这个人工的天地所包围，如同身上裹着一块甲壳似的。于是他转向其他智慧的、毫无表情的脸孔，并迅速缔结了无数逻辑的条约。真理是一位受人崇拜的残酷暴君：以它的名义、能使最幸福的人去自杀。你沿着这些笔直、整齐街道去走走吧：那儿一切都是交易、诡辩、以及按尺寸制造出来的产品。只有鸟儿拖着轻盈的身影越过那些高谈阔论的人们麇集的上空，它飞得很高，能够在这乱哄哄一片嘈杂声

中重新找到由伟大的自然声音所发出的模糊力量。

人们开始怀疑孤独者。他们的祖先尚能恐惧地回忆起暴君们的无法预料的可怕专横。这些诞生在共和国童年的神秘巨人，就像诞生在世界童年中的巨类，他们最终还是被杀了，因为他们本身是强大的，因为他们突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灾难，这些灾难与他们的能力是如此不相称，以致灾难一旦平息，人们无法把灾难与这些巨人联系起来。因而人们在城邦大门上写着这样的话：只有团结才有力量；如果某人不靠他人的帮忙却干着几个人的活，那么，他依靠的就是魔法。

由此，祸害增多了：人们驱逐了耍魔法的人，而后者却扎根于树林之中，这样，便出现了一些深奥难懂的人，他们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弯着腰、拄着拐棍，孤独地飘来荡去。希腊的流水映照出他们那阴沉、黝黑的脸庞，而那些在水波这面镜子中认出自己的人却做了自己的面孔的俘虏，他们与自己思想的关系极为奇怪。他们一会恬不知耻地寻欢作乐，毫不关心这个沉重地压在远方城市上空的真理；他们一会儿又记起了自己那火热的、却布满皱纹的面孔，他们十分害怕地注视着自身的深奥变化以及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非几何形式，他们发狂似的逃跑了：没有任何度量可言，他们是自己骗自己的江湖骗子。自然界是爱他们的，并将其秘密慷慨地奉献给他们。恐惧使他们看到了奇妙的景色。一旦他们从恐怖中醒来，他们就是万能者，他们陶醉着，并充满了自欺的精神。

这些神奇的恶棍出于需要、调皮和预言家的志向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像控制熊一样紧紧控制着他们那可怕的知识，他们让熊略微抖动一下绳子，以此作为恐吓从而获得施舍。

他们谈论着超人的威力，这些威力包围着人，而市民则不愿看到它们。他们还讲述着他们在夜晚的恐惧，他们在阳光下的欢乐，于是，在那些平等人的被搅乱了的思想里产生了模糊的共鸣，好像

在他们的普遍知识后面还藏着某种魔鬼般的东西，他们不能与之交往，相反，却被它判处不能与之相通。

不消说，每当人们从背后抓住这些江湖骗子时，总是把他们处死。可一旦他们的种族灭绝的时候，人们心里仍有某种不安：在这些熟悉的、光秃秃的山冈后面，在这些火石采石场后面，又有什么可怕景象在等待人们呢？有什么闻所未闻的危险在威胁着共和国呢？勇敢的元老院于是对大自然发起了远征。

最初感到为所有平等民众支持的那些人以民主的目光循视着事物，可当他们看到结果是那样的不平等时，他们震动了。手指上的一粒微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人的声音所引起的稍大一点的振动有时也会造成房屋的倒塌。然而那些贫瘠的、一副苦相的矿物则无声无息，僵化在它们的干枯的形式之中。一些自然种类与精神讲话，而其他种类则什么也不说，这便构成了另一个更危险的欲望。在这些优秀公民看来，自然界里的君主政体是无法容忍的。所以，他们这样来组织一个外部世界，使这个世界成为人类最出色的征服。精神完全为他们那漂亮的正方形房屋、为他们的圆形广场及大会堂所占据，从那里回想起了许多明智的话语，如同在每个人头上冉冉升起一缕独特的轻烟，他们把变化的力和自发的力区分开来。他们还小心翼翼地每个客体那里取回了人的一切能力：如果这块石块在滚动，如果它是其他石块变化的原因，于是便设想它就是肇事者，这样想是十分有害的。它所有的效力都来自被授予的威力。同样，当独裁者宣布战争时，连微不足道的投票者也清楚地知道，独裁者的这个可怕的生死大权是来自下层的。他想：“要是我不选举他，他还能派我去打仗吗？但我自己，我能引起一场大乱吗？那得有我的同伴的帮忙才行。”

权力从一些人手中移到了另一些人手中，最后又落到了撕毁协定的人手里。经过一连串的会议，经过一系列协调、商议过的行

动，人们便在此决定性的一举中取得了成果，而权力本身则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人：倘若有人以为只有他拥有权力，他便会立刻被处死。每个人仅仅是受别人、或所有其他人的委派而已，单独来考察他，他只是矿物中一块无生命的石头。

因此，完全有理由像那些城邦的虔诚者那样设想，自然界里可能有类似的委派：这是在建立民主制的自然主义。千姿百态的现象就这样完全由于人类的灵巧而让位给委派的合式差别。那些被称为社会原子的小民比城里的正直商人更僵化，如果他们单独住在一起，他们就通过合作关系相互赋予借来的权力并以此来看待太阳、蓝天、孔雀的尾巴。选民在自然界的怀抱中感到很舒适，他为景色的道德寓意而深为高兴，他会以自然界中那些高尚的例子对他的儿子们说明什么是相互帮助的善行。

这样，令人担忧的奥秘也同时消失了。如果说，自从旅行者死后，人们便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认为再也没有人会用那些神秘的语言来谈论这些奥秘了，那么，当他们得知自然界再无秘密时，这一天又该多么令人安心、令人轻松和民主啊！——如同旧恨一样，因为没有语言来表达它，所以心灵深处不再有任何东西要保存。从共和国到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以及总是来自外部的节奏性运动（该运动带着它进来时的同样重量重又离开存在物），还有那恒常的，仅仅由于多次甜蜜的微笑才显得有些生气的面孔，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魔鬼又回到了空心树里。

当战胜者让人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掷在他脚下时，他说，“不要害怕，在山岭那边，我只碰上一架略微有些生锈的机器，其设计虽不太经济，却还完好无损。我的任务完成了，该由其他人来指出其机制了。”

于是，公益社会（由于它们严格的集体性特征）便日益增多，人们称之为科学的社会。它们的首批成员无疑都是些狂热的民主主

义者，他们放弃了做生意的行当，也丢弃了社会公职以便去征服远方的大自然。要成为一个学者，他必须首先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好公民，并且具有高水平的传统精神。每个学者都依赖他的某一位同行，而这位同行则又依赖另一位。他们的研究对象也受到了这种友爱的影响；自然界也就得更友好了。原子的相互关系也更加紧密，每个学者，如同最富粘性的原子<sup>①</sup>，与过去、与现在的各位同行相联系，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这样的思想，即没有其先驱者，没有其后代，那么他便什么也不是，他的使命不是别的，而只是尽其所能来为这部集体的作品加工润色。

他们不出家门，但他们却让那些军人在打胜仗时带回大批模糊、散乱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置放在几何形房屋旁边的正方形院子里。

就在这些从别处弄来的碎片上（这些碎片由于旅途中漫长的酷暑季节而变得干燥、由于车上的颠簸又遭损伤，并且注定要受到文明器具的摧残），他们开始是偶然地、后来则有条理地试验最新的艺术奇迹，如刀剪匠、铁匠及钟表匠的艺术。他们将碎片倒入模子，加热、冷冻、揉合、分割；他们竭力用已经驯服的力量来分解它们，就像为了制服那些不肯招供的在押犯人而在犯人中安插密探一样。他们把在某台机器和某种自然的生产中观察到的关系称为规律。犯人招供了人们要他承认的东西。要是在他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做呢？

人们可以在某些哲学家那里读到（是哪一类哲学家，我们一会儿再谈），精神被全副装备、被细心地分了类，它是清晰及形式的生产者，它涂上了油，光滑，沉默不语，但要轻轻推它一下就能把它从

<sup>①</sup>富有粘性的原子（Atomes erohns）：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中，指的是这样些原子，其排列秩序可以使原子相互粘合在一起从而构成整个宇宙。

睡梦中唤醒（是其完全的透明性使它沉睡的）。没有他人，没有不透明的、不清晰的外来者，它便消失在半透明的清晰当中。但是，如果无形式之物企图奋力通过精神的不在场，那么精神便控制了它，使它昏头转向、把它分割成块、将它轧制、使它脱离躯壳，总之，使它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我认为，诞生在机器当中的哲学家所做的与古人所做的一样。古人把他们周围的日常用具一直抬高到神祇的地位。这些哲学家就精神所说的话都来源于对机器的反思并与机器相吻合。

机器先于真理，更早于科学而产生于人的某个观念（此观念是关于某个驯服的物体的）。贫乏的、赤裸裸的、毫无细节可言的物体被遗忘了，而茁壮成长的观念则借此机会长胖了。于是，第一座教堂、第一只瓦罐，总之是第一个不受死亡支配的物体就这样制造出来了。这些机器通过它们所特有的论证方式以及深入到铁和粘土之中的大小前提而日趋完善。它们的改善只能归功于它们自己，它们仔细检查着外部世界带来的东西，并按照自己形状的要求来造就那些最驯服的东西。它们标志着实践观念，标志着不愿去认识，却要迫使人们接受的思想的第一次胜利。

科学社会的民主诡计正在于使用这些机器来认识事物。他们就像一位魔术师（这位魔术师把观念的视线转向他的袖子，可袖子确实毫无指责之处，它真是空的，而大口瓶则藏在他的内衣里），他们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胸口，说道：“看吧！我们毫无例外地让事实走向我们，我们不抱成见，因为我们采取了沉思的态度。”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承认这一点时，他们却处于有利的地位：在他们那消极敞开着、无害的灵魂与事件之间，他们已安置了先人之见、歪曲性的偏见和非人的、机械性的顽固。机器在角落里隐蔽着，只需一根麦秆就能使它们的齿轮运转起来。它们抓住了

一只苍蝇，消化了它，吐出了一台机器。人们小心地把它们设计出来，只是让它们完成单一的动作，对于它们，一切都是用来完成这一动作的托词。晴雨表上的水银——它按一定的比重，通过纯化并被注入器皿，它会上升、下降，而别的则什么都不会。有人说，还需假设在机器和自然界的某些方面存在着同质性。这是没有问题的：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倾听自然界轻微的低诉并设想揭示其含义的仪器。然而，大地的低诉和人的严密思想（两者一时被强行凑在一起）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红墨水把这轻微的颤动固定在图表上，那么这颤动已不再是原来的颤动了。此外，如果小心翼翼地把晴雨表拿到这里，继而又放到别处，它仍沉默不语，那么这沉默便叫做恒常。

护民官必然要为这些暴力行为而担忧，他对学者们说，“你们能肯定一切都是合法地进行的吗？”后者回答：“当然能肯定。我们清楚地知道，无动于衷的自然界是从来不向我们作出任何同意的轻微表示的。但是，当自然界要说‘不’的时候，它完全会这样说，而它的沉默却意味着同意。”政治家也沉默了，他在这当中认出了他的一个论证：“你们说非洲人在遭受着殖民化之苦吗？但我们来看看事实吧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诉苦并起来反抗。可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他们那副既严肃认真、又悠然自得的神情，他们太无动于衷了，以至他们不能公开对我们的保护表示庆幸。他们什么也不说，反正都一个样。”

然而自然界既不说是，又不说不是，它不会通过对立面，也不会通过比较来思考：它保持沉默。思想说不，机器也说不，而脾性极坏的观念则在它们的魔爪中紧攥着一块溶化物或一块钢。

起初，科学家在他所选择的未经开发的领域内是自由的，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对他在用机器探讨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结果作出准确的解释；第二，他的思想还必须立即提供符合公

民理智的方面。但是，科学社会都是些墨守陈规的社会，到了下一代，又得加上第三个条件，即新的理论必须与已故同行的理论保持一致。这样，年复一年，这张网变得愈来愈密：被束缚的理性在暗中抵制着那些极端个人的意图。以后来了一位批评家，他把这些理性公诸于世：他的第一条反驳意见就把新建的条条框框推倒在地。是已故的笛卡儿，而不是太阳（在人看来，太阳根本无意放射小微粒或速度极快的波）证实了牛顿的错误。

无疑，新来者不止一次地推翻了他的前辈的断言，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发现了新的不可还原的事实的缘故。不过，这又使我们回到机器上来，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个事实是由机器制造出来的。然而在理论断言和机器之间，科学家总是可以选择的：可他却总是选择后者，因为它们是科学上最传统的东西。在科学的公开格言“拯救现象”后面，我猜测到了一句秘密的箴言“拯救工具”。科学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科学家相信的并不是某句人们尚能找得到其作者的话语，他们相信的是更晦涩的东西，更古老的基础，他们相信方法、度量、概念（这些概念如此深入到事物内部，以至人们看不到它们），总之，他们相信本质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非人所发明。归根到底，他们抛弃的只是那些总忘不了自己的人，即坏公民的著作。

这样，他们便控制住了他们的赞同所具有的嫉妒而又疯狂的力量——骄傲、气愤、盲目和激烈的偏护、不公平等一切把信奉某种思想变成一场猥亵的、快乐的纵酒狂欢、一切支配某个强大的思想（甚至包括爱情）的东西。众人，唯有众人以低沉的窃窃私语在脑袋里打着主意；永远也不会有人仅用他人的观点来看待他们产生出来的思想。

城邦关怀着这些孤女，并以其纯洁的双手把她们培养成人。每个人都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内看到她们成群结队地通过大街，她们